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1.02.003

彝文古籍中吴三桂形象探析 ——以《吴三桂野史》《布默战史》为例

李家鑫¹, 白兴发²

(1.西南民族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41;
2.云南民族大学云南省民族研究所,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雍正朝始,清政府对云、贵彝族聚居地区进行了改土归流,吴三桂作为清初清廷在西南疆域的代理人,在彝族文献《布默战史》《吴三桂野史》中有着不同的形象塑造;《布默战史》将之视作仇人,而《吴三桂野史》中则对其带有一丝同情。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吴三桂在不同时期对待彝族群众的政策态度不同,另一方面也归因于记忆群体所接受的记忆不一。同时,虽然两本书反映的事件有所差异,但也反映了云、贵彝族地区对于国家的认同。

关键词:吴三桂;《吴三桂野史》;《布默战史》;国家认同

中图分类号:K249;G255.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1)02-0014-06

On Wu Sangui's Image in Yi Ancient Books *Unofficial History of Wu Sangui* and *War History of Bu and Mo*

LI Jiaxin¹, BAI Xingfa²

(1.School of Tourism, History and Culture, Southwest Minzu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41, China;
2. Yunnan Institute of Ethnic Studies,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500, China)

Abstract: Since early Qing Dynasty, the royal court had been bureaucratizing the native tribal headmen in Yi populated areas. As a royal surrogate of Qing dynasty stationed in the southwest frontiers, Wu Sangui was depicted differently in Yi literary books *Unofficial History of Wu Sangui* and *War History of Bu and Mo*. In *War History of Bu and Mo*, Wu is an enemy, while in *Unofficial History of Wu Sangui*, he is somehow sympathized. Because, for one, Wu Sangui had different policy attitudes towards Yi people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his rule; for the other, it was attributed to the different memories accepted by the memory groups. Meanwhile, although the events depicted in the two books are different, it reflects the Yi people in Yunnan and Guizhou regions had the same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imperial Qing state.

Keywords: Wu Sangui; *Unofficial History of Wu Sangui*; *War History of Bu and Mo*;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顺康之际,清政府对云贵地区部分土司进行了分阶段的改土归流。吴三桂自献山海关之功获封“平西王”以来,经数年苦战平定山西、四川叛乱而深得顺治帝信赖垂爱,进而直指云贵地区,成为讨平云贵叛军的领导者和改土归流的实施者。吴三桂,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公元1612年),字长伯,原籍扬州高邮人士,将门人士,寄籍辽东,因其个人能力不断攀升至明山海关总兵。清顺治元年,因李自成在北京的追赃助饷政策使得吴三桂被“闯籍其家”而其妾陈圆圆亦“为自成将刘宗敏掠去”^{[1]12836},

“忿而中改”,剃发降清,后封疆云南。

史界就吴三桂形象相关研究已成果颇丰^①,总体而言,大多是以汉文文献为文本对吴三桂进行分析,而从地方少数民族文献对吴三桂进行研究的成果较少。吴三桂统治云贵地区数十年,“方其入滇之始,……云贵督抚咸受节制。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财户部不得稽迟,其所除授号曰‘西选’”^{[2]60}。彝文古籍文献有如《吴三桂野史》《布默战史》等均对其有所记载,目前已有学者李金发从国家和地方视野出发对《吴三桂野史》开展了研

收稿日期:2020-03-11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云贵川百部《彝族毕摩经典译注》研究(14ZDB119);西南民族大学2020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优秀学生培养工程项目(2020YYXS14)。

作者简介:李家鑫(1997—),男,江西赣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彝族历史文献、彝族文化。

究^[3],但《布默战史》研究较少,因此笔者拟以《吴三桂野史》《布默战史》为研究文本,探析两文本中的吴三桂形象。

一、《吴三桂野史》《布默战史》简介

《吴三桂野史》是广泛流传于滇南红河两岸(主要流传于今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玉溪市、楚雄彝族自治州双柏县等彝族地区)的彝族古籍文献,其成书时间约为康熙平定三藩之乱之后,以五言诗的格式记载了吴三桂因父、妾引清军入关,协助清廷平定叛乱,获封“平西王”镇守云南、叛清最后失败的史实。该书主要分为《吴三桂与顺治》《吴三桂与康熙》《康熙统天下》三个部分,其中《吴三桂与康熙》是其重点叙述部分。《吴三桂野史》一书原为滇南地区的红河州绿春县牛孔乡土嘎村李毕摩祖传家藏,于20世纪在彝文古籍征集中被发现,并经毕摩李八一昆先生加以断句标点,后为《云南民族古籍》丛书译者翻译整理,现经学者张辉、童家昌翻译,纳入《彝族毕摩经典译注(106卷)》第48卷,并由云南民族出版社于2009年出版成册。

《布默战史》是黔西北地区(包括六盘水市、毕节市等地)彝族军事古籍文献。该书辑选自多部毕摩文献,译者王继超将之分为三个时期:慕摩——六祖时期和西汉时期涉及文献为《笃慕战鄂莫》《俄索毕余攻打苏熨武》,两部文献取材自《局卓布苏》里的《笃慕诺律》《德施诺律》。唐宋时期涉及文献为《菲德论手段》《阿哲与乌撒两部的交战》《神奇剑》,上述三部文献出自毕节地区彝文翻译组的162号、249号藏书,两部藏书都是摩史用的诺沕类(文史与艺文)文献。明清时期涉及文献为《阿哲与芒布的争端》和《水西抗击吴三桂之战》两个部分,系同一部书,成书时间据其记载推断,在清康熙二十一年到二十九年(公元1681—1690年)之间,作者系水西重要属目的四十八部之一的归宗家的供名毕摩,他生活在今贵州大方与纳雍两县之间,以见闻或搜集的材料整理而成,成为迄今为止发现的贵州境内成书年代最晚的一部彝文古籍,此书的流传范围多在故水西地的今贵州大方和纳雍两县与六盘水市的水城一带,后又经水城流传至威宁、赫章一带。《布默战史》作为为数不多的彝族军事古籍,其独特价值也被楚雄彝族自治州政府加以重视,最终收入《彝族经典毕摩译注(106卷)》中第17卷,并由云南民族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成册。

二、吴三桂的形象对比

虽然《吴三桂野史》《布默战史》均为彝族古籍

文献,但二者对于吴三桂的形象塑造却是截然不同的:在《吴三桂野史》中,作者将其塑造成“敢作敢当”的英雄形象,与清朝顺治皇帝携手管理天下,对其叛清一事则抱有一丝同情;在《布默战史》中,吴三桂则被作者塑造成“外族恶人”,给水西地区带来了祸祟,造成水西君长安坤冤死,其妻子也只能被迫栖居在阿芋陡,在该书中吴三桂给水西彝人带来了惨痛的灾难。

(一)“敢作敢当”吴三桂

在《吴三桂野史》一书中,吴三桂之所以要和清朝合作的原因颇具作者的主观色彩,作者在书中开篇对其表示同情:

“苏天府大城,李自成到后…屋主老大人,确实已死去。圣上崇祯帝,逃出了宫殿,上了岷子山,到了那里后,自缢身亡了”^{[4]17-18}。

听闻这个噩耗,吴三桂的反应是昏厥了过去,待其苏醒后,其首要任务便是为皇帝报仇,去捉李自成,挖出他的胆,报了此仇恨,但阙于兵粮,他只能和顺治帝杀鸡盟誓,共饮鸡血酒,发誓要共患难,最终和顺治帝“谷俄”和“纳添”各自管理天下。

在《吴三桂与顺治》中,吴三桂引清军入关的理由由私向公,为吴三桂的形象加入了彝族尤为推崇的忠诚色彩,而非汉族文献中所载:“逆闯急欲降三桂,三桂父总兵吴襄住京城,贼逼襄书招之,襄不从,贼掠索之”才“以兵出关”^{[5]72}或“冲冠一怒为红颜”^{[6]78}吴三桂因为杀父之仇或者是夺妻之恨的个人因素所致。

在《吴三桂与康熙》部分,吴三桂镇守谷俄期间“施政有条理,办事循纲纪,庄严又肃穆”^{[5]357}并与康熙联姻互为姻娅,共享荣华富贵。但是其由于奸臣高武康、朱克子的恶劣行为:

“善事他不做,善举他不为,见财起贪心,见利就忘义,心望高处想,没有那福分,欲望比天高,眼看着天际,对康熙皇帝,早已有反心,现在还未泯。”^{[4]357}

由此可见,奸臣高武康和朱克子早有反心且贪财忘义,虽然并不具备吴三桂那样统治一方的能力,却眼高手低,极力挑拨康熙皇帝与吴三桂之间的关系,诬陷吴三桂要谋反,康熙听信谗言,吴三桂只能被逼谋反,就文中所见多表现为对吴三桂叛清的正义性的描写,有如书中通过对吴三桂所住之“谷俄咪地方”各方面治理情况的细节描写,突显吴三桂对所统治之地的舍不得,加之以十八土司对于吴三桂的鼎力支持来赋予吴三桂谋反的正当性,并以此谋求读者对于吴三桂被迫谋反的同情心。

(二)“外族恶人”吴三桂

在《布默战史》中的《水西抗击吴三桂之战》部分中,吴三桂被赋予了十足的反派角色。安坤,又名鲁德额菲,是贵州水西第 82 代君长。在其统治水西期间,“武家平西王,没有诚信,降下了祸崇”^{[7]313},发动了对水西的进犯,之所以说其没有诚信,其原因主要是安坤事件是“被制造的叛逆”:顺治十五年(公元 1658 年),五省经略洪承畴率清兵进攻南明永历政权,被李定国的军队阻于沅州,于是遣使招抚安坤,承诺给予和以前彝族统治者阿画、霭翠一样的待遇。在安坤的带领下,清军由西路小道取镇远、平越进而顺利攻占了贵阳。

此外,安坤还令汉把曾经、雄彦圣缴印投诚并带领吴三桂取开州,降修文、广顺。滇黔平定后,清廷令安坤袭任水西宣慰使,并赏赐袍帽、靴带并采币二十四匹,加都督金事。^{[8]971}而吴三桂后又欲“专滇黔,恐祸乱平而已兵权解,数激叛诸土司”^{[8]972},便只能通过陷害的方式逼迫安坤谋反,因而书中强调吴三桂没有诚信,故引战祸的恶劣形象。此外,书中还通过吴三桂叛清以及安胜祖(兹莫额菲)助平叛洗冤的叙事对比以及比喻手法来反衬吴三桂的恶的形象,有如“从前甲辰乙巳年,舒武来作恶,使我遭兵祸,兹莫心欠欠,无辜被攻打,遭受到荼炭,鹤鹑颈被套,虎豹戴铁链。”^{[7]424}

在彝族社会文化中,鹤鹑象征着彝族君长,虎豹则象征着彝族的若卡勇士,通过上述鹤鹑和虎豹成为困兽而遭受荼毒的描写暗示在吴三桂制造安坤事件后水西人民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

就二者在史实方面看,《吴三桂野史》《布默战史》都记述了吴三桂的史实,但记载的内容与汉文文献有所出入:在吴三桂引清军入关原因上,如前文所言,《吴三桂野史》赋予了吴三桂叛清的正当合法性,且由私转公,从一开始的为父报仇转变成了为明崇祯帝报仇。在吴三桂叛清原因方面,《吴三桂野史》富有同情色彩,认为是奸臣进谗言导致康熙听信其谗言而吴三桂被逼造反,而《布默战史》则臆想康熙皇帝的心理活动:

“这德补吴三桂,冬天莫喂牛,冬天喂了牛,春来触主子;莫救落水狗,救了落水狗,咬了主人手;莫迁就恶人。迁就了恶人,就培养敌人”^{[7]367-368}。

《布默战史》将吴三桂比作冬天喂的牛、落水狗、被迁就的恶人来讽刺吴三桂的不忠,但是二书都没有看到吴三桂叛清的主要原因是康熙撤藩触及吴三桂在西南地区长期经营的利益。

在吴三桂死因方面,二书与正史所载也有不

同。《吴三桂野史》记载:

“官员平西王,吴三桂他嘛,反清满五年,到了属马年,命运不济了,寿数已到顶,莫康线地方,莫康线城里,坐在龙椅上,寿终正寝了。”^{[4]458}

这与汉文献所载相符,记述吴三桂之死是在其叛清的第五年寿终正寝,时间上是一致的。不过《布默战史》则将吴三桂之死归于勇士功劳:

“阿柔直谷,是若卡中杀手,用剑砍杀,在马上进行。……把舒氏武陀尼,掩埋在地下,丧在剑尖下。”^{[7]466}

《吴三桂野史》《布默战史》虽非史家正史,与正史有所出入,但总体来看,其对吴三桂的一些事迹均做了相关记述,对于研究吴三桂有一定材料的补充,而二书在吴三桂的形象存在差异方面亦需进一步探究。

三、形象差异原因探析

上文提及《吴三桂野史》将吴三桂置于道德正义一方,其降清乃至叛清均有正当的合法性,而《布默战史》则将之视作恶人豺狼,占领彝人的土地,罪不可赦,其叛清也是对于中央王朝不忠诚的表现,理应被平叛消灭。二书在吴三桂形象对比上有着截然不同的记述,这主要归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治理滇黔政策的差异

1. 对待滇民:挥金以结人心

顺治十六年(公元 1659 年)三月,吴三桂始镇守云南,十月便被顺治帝授予总管滇省军民事务之大权,正如《清实录》中记录:

“云南远檄重地,久遭寇乱,……今至统辖文武军民,尤不可以乏人,前已有旨,命平西王吴三桂移镇云南。今思该藩忠勤素著,练达有为,足胜此任。当兹地方初定之时,凡该省文武官贤否?甄别举劾、民间利病、因革兴除,及兵马钱粮一切事务,俱暂著该藩总管,奏请施行,内外各该衙门不得掣肘。应责任既专,事权归一,文武同心,共同策励,事无遗误,地方早享升平,称朕勤乱柔远至意”^{[9]9-10}。

顺治帝出于对吴三桂的信任,无论是行政上的人事权,还是军事上的兵马大权,或是民政以及财政上的决策大全,均交由吴三桂总管,即所谓“统辖文武军民”“事权归一”,而这正好达到吴三桂自以为西南一隅以成子孙万世之业的目标。如此之下,云南地区成为吴三桂培植地方集团势力的重点区域。云南曾有谚语“滇中有三好,吴三桂好为人主,士大夫好为人奴,胡国柱好为人师”^{[10]35},即是吴三桂在云南广培私党、阴蓄私人的形象描写。白云贵

督抚以下至地方守令等各级地方官员,凡其有公事拜谒吴三桂,他一定备酒席招待,并不时地馈赠巨金。云南巡抚袁功职务调动,三桂立即赠银十万两。康熙九年,云南巡抚李天溶予告上任,三桂赠银三万两。李天溶谢绝,三桂也不勉强。及至抵达镇远,侍卫仍将三万两送至船中后迅速离去。通过吴三桂的数年经营,云南已形成了坚固的以吴为中心的地方势力集团。

2. 对待水西民众:武力平定为主

吴三桂接触贵州最开始是在平定水西叛将李定国时,安坤得知吴三桂攻南明政权并未有大的进展,遂派遣汉把将自己的官印送递吴三桂手上以示诚意,并在军事上对其有所帮助。即“西路平西大将军吴三桂尚未进。坤遣汉把曾经、熊彦圣缴印投诚于吴三桂。五月,遂导之取开州、降修文、广顺”^{[8]971}。康熙元年(公元1662年)十二月,随着“戡乱柔远”的日益深入,吴三桂的权力也慢慢扩展到兼管贵州,“贵州接壤云南,皆系严疆要地,且苗蛮杂居,与云南无二。其一切文武官员兵民各项事务,俱照云南例,著平西亲王管理”^{[11]130},权势的增长,说明清廷对其的宠信在不断增加,与此同时,朝廷的宠信则使吴三桂的权力欲望日渐增加。

而水西作为云南去往贵阳的必要通道,如贵州总督杨茂勋所言“水西地方沃野千里,地广兵强,在滇为咽喉,在蜀为门户,若于黔则腹心之蛊毒也”^{[12]14270},水西作为云贵川三省的边缘地带,也因其便利的交通位置和作为咽喉门户的重要军事地理位置,使得以武力征讨水西成为吴三桂专制滇黔的优先选择,而后乃以“坤有妾,美而体香”却不可得的名义来逼迫安坤谋反,遂造成了安坤事件的发生,进而对水西实施改土归流,最终以大方城为大定府,管辖木胯、火著、架勒、化各四则溪地区;以水西为黔西府,管辖则窝、以著、雄所三个则溪地区;以比刺(一作毗那)城为平远府,管辖的独、朵你、要架、陇胯四个则溪地区;以乌撒为威宁府,移治乌撒卫城,并设四个总兵守之的结局告一段落。

吴三桂在云贵地区一方面是以财力广培私党以获得云南各阶层的信任支持,而另一方面对水西则是直接假小妾之名义逼迫安坤谋反,以武力讨伐的方式来征服水西地区并对其进行改土归流,期间虽在改流后吴三桂上疏言称“水西初定,残黎东作无资,请发军前银三万两有奇,买牛种散给,并发军前米一万五千石,赈济贫民,督令乘时耕种”^{[11]229},其疏言亦得皇帝许可施行,但就《布默战史》作者搜集材料可见,改土归流的负面影响在彝族民众心理

显然已经留有十分深刻的印记,吴三桂“外族恶人”形象的书写即是这一印记的重要表现。

(二) 记忆群体的差异

由于吴三桂对于云贵地方民众的态度不同,其政策针对的民众即记忆群体相应地也会有不同的反映,这种反映持续地存在于民众集体记忆之中,也塑造出毕摩笔下截然不同的形象。哈布瓦赫认为:“存在着一个所谓的集体记忆和记忆的社会框架;从而,我们的个体思想将自身置于这些框架内,并汇入能够进行回忆的记忆中去。”^{[13]69}处于社会框架之中,尽管“拥有”记忆的仍然是作者个人,但是这种记忆是受集体影响的,正如阿斯曼所言:“虽然集体不能‘拥有记忆’,但它决定了其成员的记忆……我们记住的,不只是我们从别人那里了解到的内容,还包括别人讲给我们听的、别人告诉我们的或者通过其反应使我们知道什么是重要的内容”^{[14]28}。集体对于集体成员的记忆是有决定性作用的,而正是记忆群体的差异造成了吴三桂在不同的文献中有着不同的反映。

1. 滇南彝人:咸受笼络

自统治云南地区以来,吴三桂尤为注意培养地方势力,其中培养自身的亲信党羽则是重中之重。吴在治滇期间,极力培植自己的亲信势力:“新任官知县以上例谒王府,有才望素著仪表伟岸者,百计罗致,令投身藩下蓄为私人”^{[10]35},每每有新任地方官员,其中稍微优秀的,吴三桂便极力拉拢,百计罗致,使其投身足下为之效力。吴采取“轻财好士”的手段,挥金以结人心,往往为了成功笼络某位官员而不惜以数万巨资馈赠于斯,这个行为为其赢得了诸多支持。在其十余年的苦心经营下,“云南十镇大帅,及贵州提督李本深,四川总兵吴之茂,皆旧部将为腹心”^{[10]37},而其麾下将士也很乐意为之所用,当地民心也随之翕然归附,地方势力,藩镇诸夷也咸受笼络。

在此情况下,吴三桂亲信势力遍布云南,虽经三藩之乱,但亲信仍念及吴之旧恩,正如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朝鲜使臣吴道一在三藩之乱平定后不久路遇被清廷流放在沈阳的吴三桂旧部刘君德,当其问及刘君德“云南兵败城陷时事”之时,刘君德虽遭流刑,但其却仍旧公然答道:

“吴平西有勇力略,不幸婴疾,心血枯竭而死,其孙世璠亦英明文雅,济以浑厚,兵戈之中,不废书籍,及其城陷之日,索刀将自裁,宦侍辈扶掖止之,奋拳大骂曰‘自古岂有降天子哉?’亦刎颈而死,皇后亦与之同死”。^{[15]155}

旧部刘君德虽非吴三桂手下要人,但其遭流刑后却对于他国官方使臣亦表示出异样固执的忠吴之诚,何况留在云南本地的残余呢?这一集体通过自身对于吴三桂的记忆,并在与周边少数民族的交流融合中增强了有关吴三桂的记忆,加之吴三桂对“恭敬,虚怀延纳”挥金养士在民众留下的深刻印象,使吴三桂形象相比较于汉文献中奸叛有着截然相反的一面。

2. 水西彝人:广受吴祸

而水西彝民众初接触吴三桂时虽有其“因命坤袭职,赐袍帽、靴带并采币二十匹,加都督佥事”^{[8]971}。以应最初安坤帮助其攻打李定国时“阿画、霭翠故事”之许诺的诚信印象,但随后却假以“小妾”之名逼迫安坤谋反,这使得吴三桂形象一改以往,变得“没有诚信”并以武力强行征服水西彝族实施改土归流,降下祸祟,使得民众遭受苦难的经历更加深了彝族民众对吴三桂“恶”的形象的记忆,这就使得《布默战史》中作者所展现出的对吴三桂的恶的痛恨以及对安氏父子的深切同情。

吴三桂本身的割据称雄也对贵州造成了灾难,如范同寿所言“吴三桂统治贵州达 20 年之久。……吴三桂的割据称雄,不仅给贵州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延缓了贵州社会变革的步伐,更制造了清初贵州的战乱”^{[16]49}。正因如此,文献《布默战史》中处处塑造安氏家族的冤屈并与吴三桂险恶的一面形成鲜明的对比,以期获取受众对安氏的同情及对吴三桂的憎恨。

四、文献所见国家认同

虽然《吴三桂野史》《布默战史》记述的主体不同,但其均通过模糊的天下观念、统一的国家观念、忠诚的道德观念三个方面反映了彝族对于国家的认同。

(一) 模糊的天下观念

《吴三桂野史》《布默战史》书中均有大量汉区的地理性名词和制度性名词,地理性名词有如“山海关”“中国”“东北”“湖广”“江西”“福建”“河南”等地理行政区划等,制度性名词有如“皇帝”“总督”“总军”“奏折”“提督”等,这些汉区文化相关名词的大量出现,说明彝汉地区民族交流融合程度的不断加深。学者李金发曾对此颇有论述,他认为这些名词在“书中初步展现了大一统的封建国家结构,使得对天下、国家的认识从想象和抽象变成具体和明确”^{[3]24}。大量汉区地理性名词和制度性名词的出现使得滇南、水西彝族民众对于仅限于以自己生

活区域为中心的抽象和想象中的天下观念逐渐转变为更广阔的、以具体地理山川的明确的天下观念,也对中央王朝大一统国家统治结构有了进一步的认知,从而对国家有了更深层次的认同。

(二) 统一的国家观念

尽管《吴三桂野史》《布默战史》书写的历史具备真实和虚构相结合的色彩,其中吴三桂、安坤也分别被塑造成为对抗改土归流的领导者,但是这并不影响书中对于国家统一,反对分裂,崇尚忠诚的追求。《吴三桂野史》中写道:

“汉族人曾说,天上无二日,民无两君主;彝族人曾说,天上的太阳,不能出两个。世间俄罗人,两帝不成君,不能有两主。”^{[4]395}

即是说,国家统一如黄河水一般不可渡过,是民族间相处不可触碰的底线,触碰了只会造成兵戈相向的后果。而《布默战史》中安胜祖(兹莫额菲)虽经历了父亲被吴三桂诬陷被杀,自己与母亲兹莫阿琅栖居阿芋陡,但是听闻吴三桂叛清之后,果断带领各部落为臣长报仇,为臣民伸冤,帮助清廷平定吴三桂叛乱,其中也是意识到了国家不可二主。

(三) 忠诚的道德观念

再者,书中均出现了叛徒因为眼前利益最后不得善终的案例。《吴三桂野史》中描写吴三桂治理云南期间:

“官员吴三桂,在行宫里面,坐在龙椅上,官员站两边,似白鹤群立;臣子站两旁,似雁群起飞。鼓声似春雷,大钟响咚咚,施政有条理,办事循纲纪,庄严肃穆的。天上无云飘,丽日照大地,一片暖融融。”^{[4]458}

从文献中可见吴三桂在治理云南期间施政、办事都是有条不紊的,秩序井然。但是“官员高总督”与“护王朱克子”对康熙早有反心,只能挑拨康熙和吴王间的关系,“百日进谗言,千日讲碎语”^{[5]367},最后朱克子被“剥皮蒙头颅,割肉去喂狗,家眷也杀绝”^{[4]373},而高总督则落了个上吊自杀的结果,二者均未得到善终也正证明了不忠的后果。

《布默战史》中德额戳嘎啦,“叛彝归附啥,与豺狼为伍”^{[7]353},被吴三桂“用五马分尸,把恶人处置,割下他头颅,掩埋在地下,用刀割其颈”^{[7]355}。这些案例通过反面说教的方式教导彝族民众要忠诚,尤其是忠君,但最后反映的已经不仅仅是忠于自己的臣长,更多的是赋予了忠于中央政府的色彩,这突破了彝族传统的家支观念,进而升华成了封建社会的家国同构观念,突显了彝族民众通过文献所表达的国家认同。

文献中大量地理性名词、制度性名词的书写使得滇南、水西彝族民众对于仅限于以自己生活区域为中心的抽象和想象中的天下观念逐渐转变为更广阔的、以具体地理山川的明确的封建天下观念,也对中央王朝大一统国家统治结构有了进一步的认知,而国家统一底线的存在也反映了彝族大一统的国家观念,由忠诚升级到忠于中央政府的升华,则进一步突显了彝族民众通过文献所表达的国家认同。

五、结语

“在南方地区广阔的历史舞台上,在从“异域”到“旧疆”演变所呈现出的周边族类逐渐整合进王朝国家的宏伟过程中,上演着的并不只是刀光剑影的暴力征服与枯燥乏味的儒家道德说教,传统中国的大一统结构能够根据形势为地方预留一定的表达自我的空间,这一看似姑息“地方主义”的灵活性

反而有利于王朝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推行与渗透,促进了新秩序的稳定以及地方对王朝的认同”^[17]³²⁰。吴三桂作为清廷在西南地区的代理人,彝族文献《吴三桂野史》将之塑造成敢作敢当的善良形象,并对其最后的失败抱有同情色彩;而《布默战史》则将其视作外族恶人的恶的形象。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归于吴三桂统治期间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所采取的政策不一,对待各地彝族的政策不同;吴对待滇南彝族以“轻财以结人心”为主要策略,使其在滇南彝族集体记忆及群体记忆的书写中保存了善的一面;而对待水西彝族则是更多地以武力征伐为主,急欲武力扩张导致水西彝族遭受了更多的苦难,进而将其恶的一面保存在水西群体记忆的书写之中。此外,虽然《吴三桂野史》《布默战史》记述的主体不同,但其均通过模糊的天下观念、统一的国家观念、忠诚的道德观念三个方面反映了彝族对于国家的认同。

注释:

- ① 以吴三桂形象为研究对象有:叶高树.清代文献对吴三桂的记述与评价[J].台湾师大历史学报.2000(28):85;葛兆光.乱臣、英雄抑或叛贼?:从清初朝鲜对吴三桂的各种评价说起[J].中国文化研究.2012(1):22-31;吴海峰.吴三桂形象变迁研究[D].天津:天津师范大学,2020.等。

参考文献:

- [1] 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12836.
- [2] 魏源.魏源全集·圣武记[M].长沙:岳麓书社,2011:60.
- [3] 李金发.国家和地方视野下的滇南彝文古籍《吴三桂野史》[J].红河学院学报.2019(6):22-26.
- [4] 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吴三桂野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9.
- [5] 陈源.孤臣纪哭[M]//刘凤云.清代三藩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72.
- [6] 吴伟业.李学颖集评标校:吴梅村全集·圆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78.
- [7] 楚雄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布默战史[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7.
- [8] 贵州省毕节地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大定府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0:971,972.
- [9] 佚名.清世祖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9-10.
- [10] 刘健.庭闻录[M].台北:大通书局,1968:35-37.
- [11] 佚名.清圣祖仁皇帝实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5:130,229.
- [12] 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14270.
- [13]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69.
- [14] 扬·阿斯曼.文化记忆[M].金寿福,黄晓晨,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28.
- [15] 吴道一.丙寅燕兴日乘[M]//林基中.燕行录全集:第29册.首尔:东国大学校出版部,2001:155.
- [16] 范同寿.吴三桂:清初战乱的祸殃[J].贵阳:当代贵州,2010(15):49.
- [17] 温春来.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320.